

在传统社会中影响畬族文化变迁 的两种不同力量的作用

魏爱棠

【提 要】本文拟就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在古代畬族文化变迁过程所起的作用略作探讨,提出二者的作用形式虽有不同,但在作用过程中,二者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关键词】国家力量 民间力量 作用 畬族 文化变迁

【作 者】魏爱棠,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畬族是我国东南一个重要的杂散居少数民族,由于它地处汉族地区,与汉族毗邻而居,彼此关系密切,其历史文化深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古代畬族文化变迁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外部力量——国家力量与由畬汉互动形成的民间文化交流对畬族文化变迁的作用,了解它们在畬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不同地位,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在“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变迁的普遍过程,特别是对于当前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保证其行之有效地实施,具有典型的参照意义。

一、国家力量在畬族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对地方社会控制渗透不断强化和深入的趋势。随着国家政权势力在地方上的不断扩张,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也日益加强,由此带来了国家这一特殊的社会力量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的逐渐增强。特别是象畬族这样一个处于汉族文化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国家权力的干预对其文化涵化的催动作用表现得尤为显著。

迄今有史可稽的中央政权对畬族文化变迁的干预始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镇压“蛮獠啸乱”^①。从此以后,国家运用其特殊力量干预畬族文化变迁的记载不断见诸史端,并且由唐入清国家对畬族文化变迁的强制性指导措施的力度呈现出逐步加强的态势。具体来说,政治上从“恩威并济”发展到全面的“编图隶籍”。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用武力弹压畬民的反抗,为扩大汉族移民的活动范围、促进畬汉杂处程度的加深创造条件,并利用汉族移民的扩张而逐渐扩大国家郡县的实际统辖范围,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畬族内部的分化与监控,促使其社会结构逐步向汉族社会靠拢。比如唐朝陈政、陈元光父子在平乱开漳过程中对畬族采取了“且战且招”的政策,一边用武力剿灭敢于抗拒的畬民,另一边对“愿附者抚而籍焉”^②。与此同时,陈元光还“率众辟地置屯,招徕流亡”^③,迁内地民户定居闽西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设立了漳州和汀州。漳、汀二州的设置,使国家控制力量直接切入畬族的腹地,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初步移植到畬族地区,这在客观上对密切畬汉联系,促进畬族地区社会经济向封建制转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又利用平息畬民起义的机会,采取了一些旨在改变畬族文化变迁进程的政治措施,例如区别对待畬长(或有恒产者)与畬族百姓(或无恒产者),“招抚漳、泉、汀、邵武等处八十四畬

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④“令福建黄华畬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者与妻子编为守城军。”^⑤同时，还增派驻军，迁散畬族将领。这些措施有效地笼络涵化了畬族的上层，加剧了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强了对那些已归附的畬民的管理。及至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更是一改过去以羁縻为主的怀柔政策，对散居在各地的畬民普遍实行了“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的政策，使之与汉民一样隶属州县版籍，受到保甲制度的严密控制。此外，清王朝还在各畬族聚居地遍设军事据点，“山陆营汛，棋布星罗”^⑥。到此为止，畬族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原先迁徙不定的民族习性遭到了彻底的摒弃，畬族地方化的趋势急剧加速，封建生产关系最终溶化了相对落后的畬族社会。

经济上，从“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⑦转变为畬族承赋纳役等于齐民。明清以前，由于畬族深居幽谷，屡徙屡迁，政令难通，封建政府对其采取的政策多是“不悦”、“不税”，但实际上所谓“畬民不悦，畬田不税”的说法只是一种概观性的策略，封建中央政府对畬族并不是完全不税不役，而是对涵化程度不同的畬民采取不同的政策。甚至早在初唐时期陈元光就对杂居于汉族地区受汉族影响较深的畬族实行“畿荒一德”^⑧，按照全国的赋役制度将其编户隶籍，令其输粮纳役；而对那些生活在各自的聚居区内与汉族联系较少的畬族则采取羁縻政策——“不悦”、“不税”或以土官实行间接统治，即便这样，这些畬民同样要负担封建政府征收的“贡赋”，并且随着封建政府权力的扩张和畬族不断地向汉族地区迁徙，越来越多的畬民被纳入了封建国家赋役制度的控制范围。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客观上极大地加速了畬族的涵化进程，使畬民得以较为迅速地接受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与周围的汉族融为一体。此外，历代封建王朝采取招畬屯垦、教其耕种的措施，也有力地强化了封建经济生产方式对畬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为畬汉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准备了前提。如陈元光入闽以后对僻处山崖的畬族采取开山取道，兴陶铸、通贸易的政策并建唐化里，派人教归附的畬族耕种田地；1297年（元贞三年）元成宗“命于南诏黎畬各立屯田，摘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⑨1312年（皇庆元年），“又调汀、漳畬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⑩这些措施对提高畬族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畬汉交往确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上，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畬族施行一系列的民族歧视政策，迫使相当多的畬民为了谋求生存或平等进取的机会而不得不有意识地隐瞒民族身份，自我抑制本民族文化的外显内容，尤其是那些与汉文化有明显歧异或冲突的文化习俗而大量采借汉文化的内涵。如对畬族崇拜盘瓠图腾的一些民族习俗进行各种侮辱和攻击，甚至直接下令畬族改变民族服饰和风俗习惯而遵从汉俗；在科举考试中对报考的畬民进行各种限制，因此也造成部分畬族改从汉俗，改易汉姓，以避免文化冲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其结果在客观上促进了畬族的汉化。此外，统治者的教化政策多少也对畬族观念意识的改变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民间力量对畬族文化变迁的作用

由于畬族生活的我国东南各省是广大汉族的聚居区，所谓民间力量对畬族文化变迁的作用主要是来自畬汉互动的影 响。民间畬汉互动应该可以追溯到隋唐以前。随着秦汉王朝的统治，中原汉族渐迁入闽，在福建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福建汉族文化体系，这个汉文化体系与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中原汉文化基本相同。而恰在这个文化体系边缘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还分布着另一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即畬族文化体系。这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共存于东南沿海这个地理区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系的向外扩张与延展，这两种文化势必会出现交错与接触。唐朝在福建增设汀、漳二州，从政治上将畬族聚居区纳入了国家统一的统治体系，使福建特别是闽西南的汉文化从此获得了军事、行政力量的有力支撑，中原汉族源源不断地大量入迁畬族地区，把这一地区变成了畬汉杂居共处之地。另一方面，随着畬族迁徙活动的不断进行和南迁汉人势力的急剧膨胀，畬汉两个文化体系在地理上的交叠面愈来愈广，过去畬族那种“居山寂处，自安化外”的生活格局逐渐被打破，

继而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至明清时期，畬文化已完全处于强势汉文化的包围影响之下，畬汉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共有的地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因素对畬文化变迁的作用愈显突出，结果造成了畬族涵化程度不断加深。

首先，畬汉共同的地缘关系造成了畬族经济生活的地方化和生活习俗的汉化。经历了千余年的汉族人口拓殖山区和畬族的向外迁徙，畬文化圈和汉文化圈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畬族渐渐从一个相对集中的聚居民族转变为一个典型的杂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在汉文化优势笼罩下的弱小民族。福建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造就了畬汉之间共同的地缘关系。由于畬汉杂居，许多畬民零星散处在荒山僻壤，畬族村落往往小而分散，难以形成本民族的共同市场，使畬族的经济生活不得不依赖于邻近的汉区市场。他们把山区盛产的薪炭、竹器、蜂蜜、野味及稜米带到汉区市场上售卖，然后又从市场上购进他们所需的锄、耙、犁、刀、盐、布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许多畬民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如福建建阳畬族“所耕田皆汉人业”^⑩，浙江处州“佃田都是盘瓠种”^⑪。他们同当地汉族人民合作互助，相濡以沫，形成了彼此间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在不断的接触交往中，汉族的锄、耙、犁耕传入了畬区，极大地改变了畬族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生计模式，使畬族从游耕狩猎为主逐渐发展成为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型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生产力水平基本接近当地汉区，从而为其从流徙走向定居奠定了基础。民族经济生活的地方化加速了畬族民族性特色的淡化。除此以外，长期的接触共处也造成了另一重要的后果，即处于弱勢的畬文化在强势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生活习俗和某些观念意识逐渐汉化。这方面最详细的记载莫过于《建阳县志》，叙述了“嘉禾一带余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会闺中，不与习农事，奩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者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⑫《平和县志》也说：“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僮而化为齐民。”^⑬日久年深，当地汉族亦忘其自来，以致在某些地区畬汉界限完全消失，畬族融为汉族的一部分。

其次，畬汉通婚导致了文化调整。畬族原先禁止与汉族通婚。畬族中流传极广的《高皇歌》就屡屡提到：“千万人女由你拣，莫来嫁给百姓人”、“女大莫去嫁阜老”、“蓝雷三姓好结亲”^⑭等等；各地的方志文献也多有畬族实行族内婚的记载，如广东畬民，“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通婚。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⑮福建长汀畬民，“以盘、蓝、蓝为姓，三族自相匹配偶，不与乡人通。”^⑯江西贵溪畬民“婚姻惟四姓相通”^⑰。明清以后，畬汉通婚渐多，这从各地畬族、客家调查以及许多地方志的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畬汉通婚，使畬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最直接的影响。它使汉族文化迅速深刻地贯彻到畬族家庭生活的各个角落，使畬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最大限度地交融在一起，而且畬族为与周围汉族通婚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文化习俗，以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最后，畬汉人民在反抗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畬文化的变迁进程。早期由于民族隔阂，畬汉两族人民往往相互戒备，彼此讳莫如深，罕有合作信任。唐宋以后，随着国家政权对畬族统治的不断加强，畬汉交错的不不断扩大，畬汉之间的了解逐步加深，畬汉两族人民在起义斗争中的相互合作与支持逐渐增多，史籍中亦多有此类记载。这种共同的斗争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畬汉两族人民的沟通和认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三、两种力量作用在畬族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关系及地位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知，畬族的文化变迁是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不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间力量都曾发挥过不容小视的作用。国家运用其军事、行政的力量将畬族纳入了国家政权的统一体系，首先从制度层面上打破了畬族相对孤立封闭的文化空间，为全国主体文化的渗透传播开辟了道路。从陈元光开漳建置到清朝普遍实行“编户隶籍”和“编甲完粮”制度，一步步都清晰地映照出国家力量在畬族文化变迁过程中所起的先驱作用。最明显的体现

莫过于陈元光开漳建置和清朝编户齐民,这两个历史事件几乎成为畬族文化变迁史上的重大转折点。陈元光入闽镇压“蛮獠啸乱”,一开始就以文化冲突的面目介入了畬族文化变迁历程,通过战争的极端方式解决畬汉文化冲突,迫使畬族文化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全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在其取得军事上的控制权以后,又采取措施,招抚流亡,设置郡县,对归附的畬民实行编图隶籍,统一管理。这些措施吸引了众多汉人纷纷涌入畬族聚居区,第一次改变了畬族文化的原生孤立状态,造成了“民僚杂处”的新局面。陈元光开漳建置,为以后汉族文化在这一地区取得优势地位,造成对畬文化的巨大冲击奠定了基础。而清朝实行普遍的“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使国家的力量伸入民间乡野,最终把畬族固着在土地上,改变了他们“屡迁不止”、“自安化外”的习惯,使强势的汉文化得以持续地全面地作用于畬文化,造成其大规模和日益深刻的文化变迁。可以说,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撑和帮助,福建汉文化体系不可能这么迅速地取得强势地位,它对畬文化体系的涵化也不可能作用得如此的深刻而彻底。

但是,无论如何,国家力量的作用总是带有明显的强制同化的意味,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很容易强化民族隔阂,加深民族矛盾,甚至造成新的更加激烈的文化冲突。因此,在国家力量的掩护和支持下,起主导同化作用的始终是民间文化力量的自然涵化。在畬族文化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也就是这种来自民间的畬汉互动的力量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发生在潜移默化中,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然而其经久不息的力量却是无限的,能够造成斗转星移的巨大变迁。从“民僚杂处”后畬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民间自然同化的巨大力量。畬汉杂居后,畬族从刀耕火种和狩猎经济转变为山地定耕农业经济,从屡徙屡迁到定居一地,从族内婚到畬汉大量通婚,从单一民族文化发展为包容大量汉文化因素的混合文化体系,从一个孤立闭塞的独立文化整体调整为全国文化的一个次文化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无一不是畬汉长期交往,双向互动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民间汉文化在凭籍国家力量的支持极力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创造条件以便国家得以进一步强化对畬族的控制,与此同时,国家力量也借助民间汉文化的延伸不断向畬族地区渗透。比如,某些全国性的制度在畬区的确立,总是以民间畬汉互动导致畬族改变原来的行为、观念、社会准则而选择接受外来汉文化的传播作为前提。以清代的赋役、保甲和科举制度为例,明清时期畬族已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态势,畬族人民不仅同汉族人民毗邻而居,朝夕相处,而且还同他们一样受到当地汉族地主的奴役剥削。他们与当地汉族人民胼手胝足,共同生产,互助互爱,彼此影响,逐渐学会了汉族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锄、犁、耙等铁制生产工具也在畬族中得到广泛使用,畬族以往望天吃饭的农业面貌为之彻底改变,不必再四处迁徙,定居成为其社会发展的必然。畬族的定居使统治者对畬族的统治不再鞭长莫及,直接控制成为可能。于是,明清统治者改变了“有国者以不治治之”^①的惯例,开始对畬族实行普遍的“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政策,畬族从此被纳入了国家的赋役保甲制度的控制之中。科举制度在畬族中推行尤其表现出民间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起初,封建国家科举制度一直是将畬族排除在其应考对象范围之外。明清时期在周围汉族的影响下,一部分畬族子弟开始效仿汉族读书识字并“习举子业”,他们要求取得与汉族等同的科举考试资格。在他们的强烈争取下,嘉庆年间福建、浙江畬民才被“咨准一体考试”。^②

由此可见,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在畬族整个文化变迁过程中是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的。国家为其民间力量的作用提供政策上和权力上的保证,民间力量又为国家权力的拓展延伸铺平了道路。从根本上说,二者相互依靠,相得益彰。

注释

①③薛凝度:《云霄厅志》卷一一,《宦绩》,清嘉庆二十一年修。②沈定均:《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清光绪三年刊本。④《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七。⑤《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一〇。⑥乾隆《福宁县志》卷七《塘汛》。⑦⑧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畬》。⑨薛凝度:《云霄厅志》卷一七,陈元光《请建州县表》。⑩《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⑪《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一。⑫江远青、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輿地志·附余民俗》,清道光十二年刊本。⑬周荣椿:《处州府志》,清光绪三年刊本。⑭吕天锦:《平和县志》,清康熙五十八年修。⑮《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6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七册,广东上《博罗县志》。⑰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畬民附》。⑱黄联珏:《贵溪县志》,卷一四《杂类轶事》,清同治十年刊本。

[责任编辑:覃彩鸾]